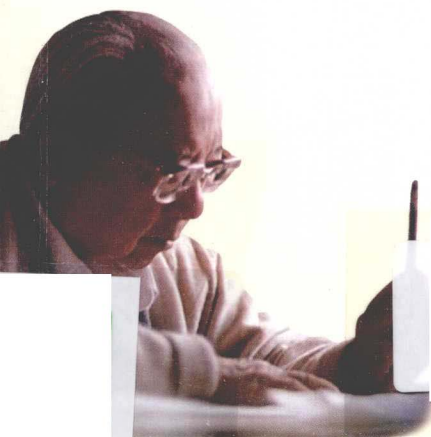


人文田野丛书 王铭铭 主编

最后的绅士

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

杨清媚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人文田野丛书 王铭铭 主编

K825.1

17-6



最后的绅士

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

杨清媚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 / 杨清媚著.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9. 12

(人文田野丛书)

ISBN 978-7-5100-1798-8

I. ①最… II. ①杨… III. ①费孝通(1910~2005)—人物研究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0728 号

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

著 者:杨清媚

丛 书 名:人文田野丛书

主 编:王铭铭

筹划出版:银杏树下

责任编辑:马春华 方 理

出 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版人:张跃明

发 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销 售: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团河路老三余工业开发区 邮编 100021)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17 插页 4

字 数:300 千

版 次: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教师服务:teacher@hinabook.com 139-1140-1220

投稿邮箱:onebook@263.net

编辑咨询:133-6631-2326

营销咨询:133-6657-3072 010-8161-6534

ISBN 978-7-5100-1798-8/Z·287

定价:30.00 元

(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1282469)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由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之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资助出版

系该中心课题成果

前 言

本书是一项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同时也是一项关于费孝通学术思想的中国人类学史研究。费孝通为 20 世纪中国人类学奠定了基础,他的思考和研究影响了中国人类学的历史进程;只有理解了他,我们才可能理解中国人类学的历史和未来。在我看来,理解费孝通意味着理解他的思考方式——我称之为“心史”,这一思考方式并非他个人主观的心理活动使然,其本身即具有客观的、集体的性质,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和走向。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费孝通的“心史”,也是在理解这一代知识人所奠定的中国社会科学思考逻辑和特征。具体来说,我是要在费孝通身上看到中国学人内在的、延续的思想观念是如何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历史中表达自身的。

受到格尔兹《作品与生活》(*Works and Lives*, 1988)一书的方法论启发,我在对费孝通的人生史进行理解的基础上,围绕他的文本展开论述。我主要关注的是他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至 2003 年这段时间的书写。王铭铭曾经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对 20 世纪中国人类学的研究特点进行过总结,认为中国人类学的百年历史沉淀为三个圈层——以汉人农村研究为主的核心圈、以少数民族研究为主的中间圈和最外圈的海外研究,并认为这三圈图式实际是中国士人“天下观”的延续。在他同时代的学人中,费孝通是少有的在这三圈都有实地研究和作品的人,同时他自陈是一名中国“绅士”,表明自己对中国士人的心史继承。因此不妨以“三圈”来看他的书写,则对他而言,这“三圈”既是现实的地理,也是他心灵的地理。

《江村经济》作为费孝通最早的一项较成熟的汉人社区研究,展示了他逐渐形成的关于中国社会研究的思考特点,即从乡村工业进而关注引导乡村变革实验的新绅士,并将后者视为他的现代化方案中的核心力量。

实际上费孝通思考的是韦伯式的问题,他的社会转型方案沿着资本主义制度与伦理的关系思路而开出。乡村工业作为一种现代化制度,与之搭配的基础是乡土中国的社会伦理。他既描述了乡村在中国由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现实变迁,也描述了他观念中的乡土中国。其后他的《禄村农田》、《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中国绅士》等从不同方面论述这一想法。在20世纪30—40年代这段时期,马克斯·韦伯和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均对他产生过影响;并且他从导师吴文藻那儿继承的带有德国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化”概念,也形塑了他的思考方式。

与核心圈所面对的客观历史的断裂不同,费孝通在中间圈看到的是帝国历史的延续。这些在山区、森林和草原上流动的少数民族仍然延续了在帝国时代的生活方式。在费孝通看来,帝国历史的目的是乡土化,进而才是本地工业化,因此内地农村面临的是乡村工业化的问题,而少数民族地区则面临的是乡土化或定居化的问题。推动中间圈的乡土化,也是一种中断客观历史延续性的方式,由此核心圈和中间圈的等级与整合都得到了保持。这一想法从1935年他对大瑶山的研究开始已经出现,也出现在他50年代及80年代以后的民族研究中。因为他仍保持着帝国心态,他对“民族”的讨论脱离不了帝国教化的历史,这一方面为文化多样性和地方自治留下了空间,同时也使他无法摆脱以汉人为中心的文化中心主义。

费孝通笔下的海外圈包括了西方和非西方;其中,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是他的讨论当中最重要的部分。一方面他希望从西方学习现代化模式,另一方面他又质疑西方资本主义能否给人类带来美好未来。这一困境同时也是19世纪末以来中国学人的共同困境。其原因在于这个天下图式中海外圈位置的颠倒——从过去离我们最远行至最近;它既是客观历史的断裂,也是中国学人知识视野的颠倒。

晚年的时候,费孝通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与作品。他将中国社会解释为一个“人文世界”,并回归绅士研究。通过重新阅读他的老师如马林诺夫斯基、派克、史禄国,以及著名历史学家如钱穆、陈寅恪等人的作品,费孝通试图理解自己所继承的思想脉络并将其以社会科学的方式表达出

来。他所说的“文化自觉”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提出期待,希望知识分子提高自身文化修养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和平共处。费孝通的反思或许是因为他意识到,要为中国现代化同时开出制度和伦理这个问题太大,要谈解决也为时太早,不如退而认清自己的历史传统更为现实。

综上所述,我的结论是:费孝通在心史的延续与客观历史的断裂之间书写,他的思考应在学术的内在理路中获得定位,并且他的研究构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必经阶段。诸如“乡土中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文化自觉”等作为他的心史表达,与他对三圈的社会变迁书写形成对照。因为他对心史的坚持,使他完不成从天下到国族的转型。我们对他的心史的不了解,导致我们不断书写这一客观历史的断裂。尽管费孝通坚持绅士的道统,但他却不了解这些观念有其自身的历史,而且他仅关注了其传统中治平学的一脉。因而在他看来,绅士的道统意味着承担整个社会的责任;在他的现代化设计中,绅士的负担太重而无法解放。最后,我将反思格尔兹的人类学史研究,指出民族志并非仅是人类学家与文本的对话,人类学家同样要受到他者的影响。费孝通同时作为“土著”和研究者的身份,表明人类学家在思考的同时,“土著”也在思考。

这本书是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修改而成的。本书的写作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这个过程使我开始了解什么叫做学术思考。严格地说,这本书的写作并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劳动成果。这个选题是2006年我初入中央民族大学师从王铭铭教授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不久,即听从王老师的建议而选定。他的严格要求使我三年来未敢懈怠;我也深知自己资质有限,实未能将老师思想之万一发挥尽致。然而承蒙同仁不弃,我不断得到周围老师、同学的教导和帮助,尤其是王老师、三位师兄——赵丙祥博士、梁永佳博士和张亚辉博士,没有他们,我是不可能完成这项研究的。他们给我的思想刺激和闪耀的观点,令我今后都受益无穷。我尤为感激张亚辉博士的无私帮助,与他的讨论时常令我茅塞顿开,思路更加明确。论文初稿还得到渠敬东教授非常细致的批阅和修改,给我莫大的鞭策和鼓励。此外,还有师兄张原博士、师姐汤芸博士,曾抽空阅览论文初稿,提出不少宝贵意见,使我能够更精细地琢磨我的论文。

同时,我要感谢那些关心我的研究并热情给予各种帮助的人。潘乃谷教授曾耐心接受过我的访谈;杨圣敏教授和王建民教授在百忙之中曾抽空和我谈过费先生的不少往事。2008年寒假我到广西金秀大瑶山重访费先生的田野地点,承蒙县委宣传部、党史办等热心接待,覃玲玲姐待我如亲人。六巷村村委会主任蓝奇峰一家接纳我住下,在冰雪封山之时给予我不少生活上的帮助和调查的重要信息。

我还要感谢在我论文开题和答辩时给予我指导的各位老师。杨圣敏教授、罗志田教授、杨念群教授、王建民教授和潘蛟教授听取过我的开题报告,并为我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不少宝贵建议。英国伦敦大学的 Michael Rowlands 教授作为我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无论在答辩会上还是私下谈话中,都对我的论文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问题,并鼓励我进一步拓展自己的研究。刘铁梁教授、翁乃群教授、赵旭东教授等作为我的答辩委员,给予我许多宝贵的指导。

我非常接受这些善意的批评意见,也尽可能去照此修改。惜资质愚钝,这份习作仍有许多浅陋之处,远不令人满意。只是它作为一个脚印留下来,激励我继续向前走。也希望得到更多专家批评指点。

还有许多人给过我帮助,请原谅我无法在这里一一提到。我身边的老师、朋友、同学和远在家乡的亲人,一直教育我要学会坚强、宽容和理解。这是我求学中最大的收获。

丛书学术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戎(北京大学)

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

王铭铭(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刘铁梁(北京师范大学)

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

杨正文(西南民族大学)

张江华(上海大学)

周大鸣(中山大学)

和少英(云南民族大学)

范 可(南京大学)

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

徐新建(四川大学)

翁乃群(中国社会科学院)

郭于华(清华大学)

彭兆荣(厦门大学)

潘守永(中央民族大学)

潘 蛟(中央民族大学)

目 录

前 言	001
-----------	-----

第一章 导 论

1.1 研究费孝通的主要方式及其问题	004
1.2 如何研究费孝通:由“三圈”展开的论述	013
1.3 如何拓展人类学史研究:总结、问题与启发	016
1.4 从作品到思想:对思想史与心态史研究的借鉴	024
1.5 资料整理与章节概要	030
资料搜集与整理	030
章节内容概要	033

第二章 见证最后的绅士阶层:费孝通的人生史

第三章 核心圈之书写:绅士与乡土

3.1 《江村经济》与江村意象	056
马林诺夫斯基的序言:“活历史”与“文化动态论”	058
丝、航船与绅士:新地方志与帝国史	064
乡村社区研究谱系中的《江村经济》	074
费孝通的社会观:“文化”、“社会”与“社区”之关联	084

3.2	类型比较与乡土工业实验	096
	从江村到禄村:乡土工业与绅士的责任	098
	乡土社会的伦理:消遣经济与宗教	107
3.3	被乡土束缚的历史:生育制度与乡土中国	116
	盛名之下	116
	制度与伦理	120
	固定的乡土与漂泊的士人	129
 第四章 绅士:在历史与空间中的讨论		
4.1	中国社会结构的纵式探讨:皇权与绅权	142
4.2	帝国的空间政治结构:城、镇、乡村之关系	152
4.3	知识分子问题的中断及以后	156
 第五章 中间圈之书写:历史在帝国的边陲		
5.1	大瑶山:社会人类学者的初次旅行	167
	患“土地饥饿症”的少数民族农民	168
	在教化之地寻找绅士	173
	帝国历史的延续	176
5.2	不合时宜的辩论:“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	182
5.3	中断的使命:民族访问团的“绕境巡游”	187
	帝国心态下的文化多元	188
	民族关系史的视角	191
	如何定义“民族”	195
5.4	民族、区域与历史:民族走廊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199
 第六章 海外圈之书写:向西方寻找科学		
6.1	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	209
6.2	世界另一端的帝国	214

第七章 重归人文世界

第八章 结论:在客观历史的断裂与心史的延续之间书写

8.1 文明与心史	235
-----------------	-----

8.2 继承与反思	239
-----------------	-----

参考文献

英文文献	252
------------	-----

中文文献	253
------------	-----

出版后记	261
------------	-----

第一章 导 论

1998年夏,时年88岁的费孝通先生刚如愿卸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公职不久^①,在家中接待来自台湾的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②两人的谈话在愉快的气氛中开始,然而不久即出现了小小的波澜。费孝通表示,他想谈谈自己今后几年专心做研究的打算,希望听听老朋友的意见。^③李亦园回答道,他认为费孝通为人类学、社会学做出了两个贡献,一是提倡应用研究,二是提出了人类多元文化的相处之道,希望费孝通能继续这两方面的思考。^④这个回答并不能令费孝通满意,他开始批评自己缺了国学这个底子,因而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总不容易体会,最近正在读顾颉刚、钱穆和傅斯年等人的传记“补课”。^⑤他特别提到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令他想到了自己的归属:“我的归属是在新学教育的基础上形成的。陈寅恪的归属是在过去的时代……他能和明清之际的知识分子心心相通……我是自觉把自己放到农民里边去的。可是实际讲起来,还不是真正的农民心理。我的本质还不是农民,而是大文化里的知识分子,是士绅阶级。社会属性是士绅阶级,文化属性是新学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⑥接下去的谈话似乎出现了某种微妙的拉锯,李亦园一直在谈费孝通的“两个贡献”,而费孝通则时不时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继承”。在谈话的结尾,李亦园再次总结了上述“两个主题”,费孝通却引几

① 林祥主编:《世纪老人的话——费孝通卷》,204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② 费孝通、李亦园:“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见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4卷,379~399页,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③ 同上,380页。

④ 同上,380~382页。

⑤ 同上,382~383页。

⑥ 同上,383~384页。

句夫子语告别：“老来求知，多几次‘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多几次‘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①

费孝通在谈话之中的“表白”透露出对自己能被人理解的期待，但这显然并不容易做到。他对自己归属的强调，实质是要表明他作为一位不同以往的“新”绅士是怎么思考社会的，并且他在晚年看到了这种思考方式的局限。他相当委婉地拒绝了由不同“贡献”组合起来的“费孝通”形象，在这些形象背后他感受不到归属。这种归属感不独属于他个人，而是一代知识分子“心心相通”之处，属于一代学人面对历史的共同心态。社会科学构成了他主要的学术素养，也参与构成了他的思考和观念的表达方式，而这些表达受其心态所左右。曾经有人建议他写一本自传，他回答道：“其实，我一生所写下的文章就是我的‘自传’，不必再另外写了。”^②言外之意是说，即使再写一本自传，也只是再增加一个文本，并不必然增进对他的理解，与其期待他的自传不如重新面对他的书写。

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这是费孝通完整的人生起止，而他真正与人类学结缘是从1930年他进入燕京大学开始。其后，他的人生旅程和他眼中的世界图景不断在书写中展开：从故乡的水路到海外的西方，从中国的东部沿海到内陆边疆的民族走廊，仿佛在他的心里仍有一张古代中国的世界地图，覆盖了汉人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更遥远的海外。他像一位周游“天下”的“游士”在这张地图上旅行，同时也带着士大夫的使命感一直关注着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他以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开始了对这一社会的探索，也以他的研究发现参与形塑了中国人类学的早期面貌。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研究、80年代以后的学科重建和学术反思，尽管其间走过了一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的道路，费孝通仍表明，“我的研究没有丧失人类学的意味”^③。他的人生与书写，既表明了这一代知识分子与民族国家构建的

① 费孝通、李亦园：“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见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4卷，389页。

② 费皖：“写在前面的话”，见费孝通：《费孝通在2003——世纪学人遗稿》，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③ 费孝通：“序言”，见其《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2页。

复杂关系,也构成了知识分子所处的变迁情境,呈现了东西方关系中的知识分子的命运;而他对人类学学科看法曾有的变化,从中亦可以看出中国人类学的学科转变及意义。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奠基人,费孝通影响了整个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过程;而且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书写,构成了面对新的世界格局,中国学者如何思考自身的表达方式。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他,就是在多大程度上寻找值得追溯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之未来的基础;理解他就是在理解中国人类学的历史和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是中国人类学学术史研究的重要个案,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反思自身的重要个案。也因此,本书虽然立足于中国人类学学术史研究,但其关怀却关乎中国社会科学的总体问题。这项研究将通过费孝通这一个案来探讨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方式,通过对他的理解来总结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并从对他学术遗产的继承与反思中提出对于开拓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之未来有所助益的思考。

费孝通一直期待的理解是对他思想世界的回应与对话,解读这些思考也是在解读他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史。因而,这项研究将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费孝通的作品解读上,结合他的人生经历与见解对他进行整体的解释与探讨。这项研究的具体化则首先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本书将如何研究费孝通?二是相比已有的人类学史研究,本书的新意在何处?

1.1 研究费孝通的主要方式及其问题

国外学者对费孝通的研究,多来自对他较为熟悉的英、美、日学界,如阿古什(David Arkush)的《费孝通传》(*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①、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的“Social egoism and individualism – surprises and questions for a western anthropologist of China read-

^① David Arkush, *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82.

ing Professor Fei Xiaotong's contras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①,等等。此外,1996—1998年,北京大学编辑了两套纪念费孝通学术活动60周年的文集《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②和《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③,较为集中地收录了对费孝通学术研究的探讨,其中不乏国外学者如中根千枝、王斯福、石瑞(Charles Stafford)、莉萨·皮蒂(Lisa Peattie)、穆克季(P. N. Mukherji)等人从不同方面理解费孝通。

总体来说,能够较为完整地讨论费孝通的人生与学术之作并不多。在这些研究当中以阿古什的《费孝通传》^④、张冠生的《费孝通传》^⑤及潘乃谷、王铭铭主编的《重归“魁阁”》^⑥三本书更具有代表性,它们的书写脉络分别呈现出费孝通研究的三种主要方式,其中一些研究不乏构成对费孝通的某些“共识”的观点。

阿古什的《费孝通传》写作于20世纪70年代,这项研究在国际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阿古什也成为西方学者研究费孝通的第一号人物。^⑦

① 来自王斯福教授所赠手稿,其中文译稿已发表:“社会自我主义与个体主义——一位西方的汉学人类学家阅读费孝通‘中西对立’观念的惊讶与问题”,龚浩群、杨青青译,越旭东校,载《开放时代》,2009(3)。

② 邱泽奇、王铭铭:《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上、中、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③ 潘乃谷、王铭铭:《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上、下,北京:群言出版社,1998。

④ 阿古什:《费孝通传》,董天民译,洛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⑤ 张冠生:《费孝通传》,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

⑥ 潘乃谷、王铭铭主编:《重归“魁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⑦ 大多数西方学者对费孝通的了解来自他早年在海外出版的《江村经济》(*Peasant Life in China*, 1939)、《乡土中国》(*Earthbound China*, 1949)和《中国绅士》(*China's Gentry*, 1953)。阿古什的研究大大丰富了西方学者对费孝通及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认识,同时他也是第一位较为全面研究费孝通生平与学术的西方学者。在《费孝通传》之后,阿古什又与人合编了《无鬼的土地》(*Land without Ghosts*)一书,选编了1848—1987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在美国的见闻札记,从中国人眼中美国形象的变化来看时代变迁之下中国人对美国认识的逐步深化的过程;认为经由中国人所写的对美国文化的观察,为美国学者提供了一种 outside 的视角,这对现代世界中越来越互相关联在一起的中美两国的未来及构建更良好的相互关系有着重要意义(R. David Arkush & Leo O. Lee trans., *Land without Ghosts*,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这本书的标题及其中一篇文章来自费孝通1944年《初访美国》中的一章。将这两本书比照阅读,表明阿古什对于费孝通的论述中尤为欣赏的费孝通作为中美“文化中间人”的形象并不是没有理由的。